

今天,为什么要提倡君子人格教育

——读《君子人格六讲》

■段海宝

记得读过冰心先生的一篇小文,题目是《生命从八十岁开始》,是她在病中写给小读者的,文中她豪迈地表达了病好后将继续从事文学创作的雄心!读后万分钦佩冰心老人顽强的生命力和创作的使命感。冰心先生我无缘得见,常常引以爲憾。然而恩师牟钟鉴先生同样诠释了这句话的精神。年逾八旬的他不知老之已至,迸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创作活力,进入他学术和思想的又一高产期。近些年来,他不仅完成了《新仁学构想》这样成一家之言的理论创新之作,还完成了《儒道佛三教关系简明通史》这样具有填补空白性质的重要学术著作,同时,还出版了《中国文化的当下精神》等一些既具有学术性又适合普通大众阅读的著作。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君子人格六讲》,则体现了他致力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反思和整合后普及大众的努力。本书虽然篇幅不大,然而所包含的道理和作者的良苦用心可谓深切矣。孟子说:“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此之谓也。

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大脉络来说,传统文化已经渡过了它的争议期,不论是“全盘西化”的文化虚无主义,还是“复兴国学”的文化保守主义,基本都退出了历史舞台,不能再干扰人们对传统文化持有一种辩证理性态度,即“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然而如何“批判继承”,将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到现代的文化系统中;如何“古为今用”,将优秀传统文化恰当嵌入现代人的生活中,则是我们当前最需要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难题。鉴于此,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文化整合方案,试图找到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如“综合创新说”“西体中用说”“创造性转化说”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弥合了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及现实社会的疏离。但整体而言,“批判继承”的理论探讨有余,“古为今用”的落实工夫不足,也是很明显的事实。

《君子人格六讲》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要素凝练成人格理论,将对文化整体的关注转化到对现实个体的关注上,从而找到了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现实力量的着力处和“下手处”。之所以表彰“君子人格”而不是“圣人人格”或“好人人格”,诚如作者所言:“圣人人格”,高而难行,倡之恐其流于伪;“好人人格”卑而易行,倡之畏其入于俗。只有“君子人格”理想性与可行性兼备。

君子人格的内涵是: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语言洗练、层次分明、结构完整,是对儒学“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注重个体修养思想的明确继承,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两家根本质素的综合创造性提升,因而又是一种现代性的人格理论。“君子人格”反映了“君子”这个群体在对人、对事、对己等方面总体性、普遍性的倾向和心理特征,关注的是后天人格的培养。

君子人格的培育和君子群体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有一个理解认同的过程,更需要有一批道德精英自觉地守道德、行道德,抵制恶风浊俗,形成政君子、军君子、匠君子、商君子……“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从而影响社会风气。作者更为看重的是师君子,因为“对于青少年的培养,主要责任在教师”。只有形成师君子,才能“纠正学校轻德重智、只教书不育人的不良教育倾向”。这既是对现代教育

短板的一个清醒认知和有力补充,也抓住了君子人格培育中最核心、最可塑的群体。

君子人格的培育和养成,一是通过理智的理解以达到认同,二是要通过“君子的道德要求,讲好中国故事,用历史真人真事,使道德理念呈现为活生生的人的言行,来感动青少年”。作者在每一讲中都列举了大量的人物故事来彰显君子品德,激起读者向往之心。如举郑板桥焚烧家奴契券例子彰显君子仁义品格,举爱因斯坦修身格言彰显君子的涵养品格,举抗日卫国烈士的例子彰显君子有操守的品格,等等。大量故事的援引,在于引起读者的兴趣,深层用意则是因为君子人格的形成需要榜样力量的感召。

什么样的人的书才最可信呢?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指向道德实践的学问来说,只有作者的“行”才是最可信的“言”,孔子所谓“听其言而观其行”是也。君子“六有”品格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表述,莫不如说是牟先生本人的真实写照。牟先生有一句名言:“用儒家的精神去做儒家的事情”,反对学问异化,指向学行统一。他的学说和做人的品格是相互促进、互相发明的。

君子“六有”在牟先生学行上都有切实的体现。就有仁义来说,他从理论上接通了儒家的仁学大动脉,并吸收了中华文明其他各家和西方文明的优秀因子,创造了“新仁学”,使儒学获得了适应当代社会的新形态,并将其广泛运用于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析对现实生活有所裨益。在个人修养品格上,他有深厚的仁者襟怀和世间大爱,草木天折、禽兽哀鸣,都能感发他的同情之心。记得有一年,雪来得特别早,树叶尚未脱尽,积雪厚厚地压在树枝上,牟先生不无忧地地望着那些树枝,生恐其被积雪压坏。在同行、学生和许多社会人士看来,牟先生本身就是一块道德高地,在学问上有困惑、人生有不如意时,都不约而同地找到牟先生,从他那里得到学问的提升、心灵的净化、精神的感染。只要有人来问学,牟先生从不嫌劳烦,给学生答疑解惑,所教人者也正是仁义二字。这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却乐此不疲。

就有容量来说,牟先生主要是继承了儒家“和而不同”及道家“道无弃物,常善救人”的思想,并鉴于中华文化内部各学派“并行而不相悖”的良性生态,将其概括为“多元通和”的文化模式。牟先生本人也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者。在治学的范围上,他以马克思主义根本精神为指导,兼治中西,尤以中学为突出。在中学领域他兼治儒道佛三教,旁及墨家等诸子百家,尤以儒道二教为突出。最后他将自己的理论成果运用于解释和解决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上,并创立了“民族宗教学”这一新的学科。在学术观点上他不苟求其同,即使与自己的老师和挚友,在学术观点上有分歧;他也不强人从己,即使是学生、晚辈,他也非常尊重其想法。在教书育人上,他从没有门户之见,不论是不是自己带的学生,他都一视同仁,尽心尽力地培育,即使是非哲学专业的学生和社会人士来请教,只要来学,他必有所教。

其他“四有”在牟先生的学问与人格上亦有深刻的体现,此不一列举,读者“观其书、知其人”便可明察。以君子人品写就君子人格,这是本书的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是作者在当代社会提倡“君子人格”的底气。

据《中华读书报》

俭德的三重意蕴

■王 颖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今年8月又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俭德是中华民族普及最广、传播最久、受认可度最高的美德之一,为修身、齐家和治国的必备品质。崇俭反奢,始终是中华民族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导向之一。深入理解俭德意蕴,有助于人们在新时期更好地践行俭德。

俭以养德

《说文·人部》有言:“俭,约也。”段玉裁注:“约者,缚束也。”《玉篇》亦言:“约,束也缚也。”意即用绳子进行捆绑、缚束。《诗经·小雅·斯干》有“约之阁阁”句,就是描述因捆绑而显得上下紧张的样子。由缚束而引申出抽象意义的约束、节制,就是俭德的本义。《礼记·乐记》有“恭俭而好礼”,《论语·学而》有“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其中的“俭”字皆为此意。进而,又由约束、节制义引申出在消费财物上的具体要求:节俭、节约和不浪费。节俭节约之重点就在于少用、减用,“少”“减”所呈现的是一种内向回缩的收敛趋势,故古人亦以“敛”释俭,如“俭者,敛也”“广较自敛谓之俭”。这一消费上的收敛趋势,因能直观展示出个体的节俭力度和决心而较易得到外界的关注和赞誉,个体由此获得的强烈认同感和愉悦感,又推动其在后续行为中坚持和强化这一趋势。久之,就会形成对物欲的良好管理,使之处于一个合理范围,有效防止物欲泛滥。正是基于“俭则寡欲”的认识,人们确信“俭以养德”,特别是有助于养成廉德,即“惟俭可以助廉”,甚至认为“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俭德是养成廉德的必要前提。至于其中的缘由,石成金一言以蔽之:“俭则无贪淫之累,故能成其廉。”司马光在《训示录》一文中,则从欲之多寡对君子和小人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上阐释了俭德对于廉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就不会因外物诱惑而被人利用,就能在公务中坚持原则“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小心谨慎节约用度,从而远离罪恶,使家境富裕;反之,君子多欲,就会因贪图富贵不走正道而招致灾祸;小人多欲,就会因多方钻营随意浪费而丧生败家。这样的人,当官就会贪赃受贿,不当官就会行窃为盗。

爱物惜物

俭德作为一种收敛式消费导向,最低标准就是不浪费,其实际是对劳动果实的爱惜和对自然资源的保护。首先,劳动果实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物质基础,是无数劳动者辛勤工作的共同成果。对劳动果实的爱惜中,就包含着对劳动和劳动者的理解、认可与尊重。唐诗《悯农》传颂至今,朱柏庐“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代代相传,都充分反映了人们对此观念的高度认同。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

们可直接观察到“稼穡之艰难”以及劳动果实之不足,从而更易于生发和强化对劳动果实的珍视情感;而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迅速,劳动产品日益丰富,劳动形式也发生转变,故有些人对劳动艰辛的认知以及对劳动果实的珍惜开始弱化,客观上造成了不以为然的浪费。其次,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储备,但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疏》中有言:“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如果对自然资源不节制使用,即使数量充足最后也会枯竭。不仅如此,无法预知的天灾人祸还会突然打断各类资源的生成链条,可能造成物资的严重短缺,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为人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危机意识,“有日常思无日,天晴防备天阴”“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左传·庄公二十四年》说,“俭,德之共也”。俭德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得到高度倡导,甚至被视为最大的美德。它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流价值导向之一,与其作为应对资源有限性的积极策略是分不开的。

崇俭戒奢

俭德并不追求无限节俭,而是主张量入为出。即根据自身实际经济能力规划开支,“富家有富家计,贫家有贫家计”;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鼓励“日常有余”,以为“意外横用之备”;反对超出能力的消费。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拥有巨额金钱就可以追逐奢华,肆意消费。一方面,个体金钱虽有明确归属权,但是通过金钱消耗的资源则属于所有人;另一方面,对资源的过度消耗,本身就与节俭要求相背离。因此,人们赞誉那些贵而持俭、富而居俭的典范,这些人虽身居高位或家境富足,但都崇俭戒奢。如汉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值百金”,故自觉放弃不造;再如徽商虽富甲天下,但“走长途而赴京城,芒鞋跣足,以一伞自携,而吝舆马之费”,等等。

俭德并不以对财富的绝对占有为至善,而是主张不吝不嗇。吝的本义是遗憾、悔恨,《说文·口部》有“吝,恨惜也”。嗇的本义是收获谷物,其甲骨文字形反映的就是粮食收入谷仓的情形。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上说:“此字本训当为收谷,即穡之古文也。”吝、嗇二字时常连用。吝、嗇、俭三字的引申义都有强调爱惜外物的意思,但又具有本质的区别。“俭者,节其耳目口体之欲,节己不节人。”俭的核心是“节己不节人”,要节制和控制的乃是自身的物欲和财物消费;至于对他人的救济援助,则尽可慷慨大方,并不需要刻意节制;但吝嗇则不同,“吝者,穷急不恤之谓也”,由于对财物过度爱惜,所以根本不舍得花钱救助他人,节己亦节人。王夫之说:“吝者,贪得无已,何俭之有。”指明吝嗇的实质就是贪婪,这种态度并不属于节俭。因此,我们在道德实践中要崇俭戒奢,积极弘扬自身虽节俭质朴但却能恤贫救苦的美德和行为。

据《光明日报》



传承好家风 ■李景山



大战“双 11” ■高晓建



举报为公 ■尹元钧



无题 ■马菁海



口是心非 ■赵玉宝



最后的实话 ■顾培利



饭后 ■张书信



时代在改变 ■孙健



结伴而行 ■宋旭升



特别儿童 ■郝延鹏



应接不暇 ■刘志永



投稿邮箱: 1169447255@qq.com